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亚洲研究集刊》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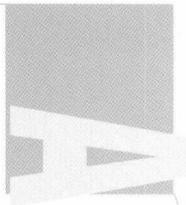
# 转型中的亚洲文化与社会

Asia Research Cen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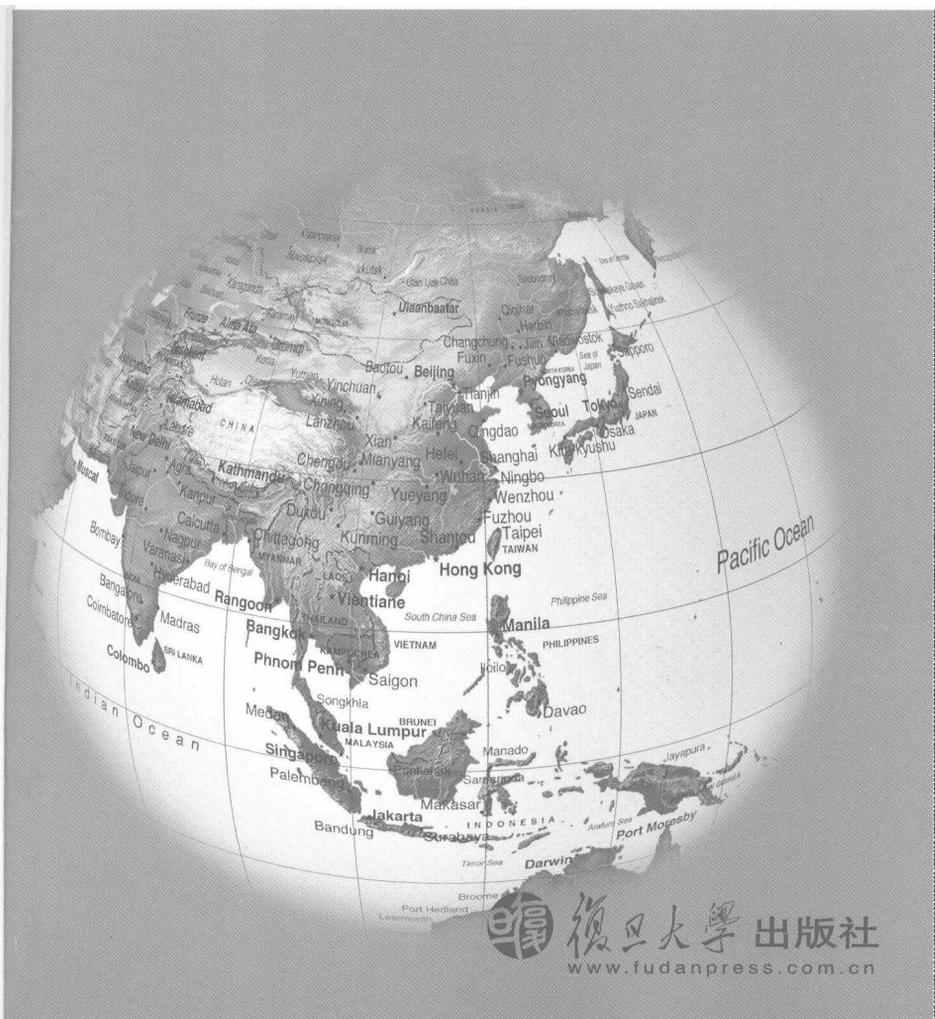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亚洲研究集刊》第四辑



# 转型中的亚洲文化与社会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中的亚洲文化与社会 /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12  
(亚洲研究集刊. 第四辑)  
ISBN 978-7-309-06508-4

I. 转… II. 复… III. ①文化—研究—亚洲—文集②社  
会—研究—亚洲—文集 IV. G13—53 D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729 号

转型中的亚洲文化与社会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编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史立丽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9.75 插页 2  
字 数 365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508 - 4 / G · 814  
定 价 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编委会

**主 任** 王生洪 金在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华 民 吴景平 郑祖康 姜义华

顾云深 倪世雄 董茂云

**执行主编** 吴景平

**编 辑** 张徐乐

## 编者前言

本辑亚洲研究集刊的主题为“转型中的亚洲文化与社会”，选定文稿的考虑，兼具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涵盖了金融、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文献考订等领域。

在专题研究栏中，本辑收入了几篇关于东亚国家金融变迁的文稿。《战争：日本金融体制的推进器——论日本金融体制的历史变迁》一文，从日本企业主要通过银行信贷筹措资金这一特征入手，剖析了具有这一特征的日本金融体制的演变同历次战争的密切关系，进而分析了日本金融体制在推动日本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和弊端。其次是《日本银行业超巨型兼并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一文，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启动的“金融大爆炸”以及21世纪初展开的金融大兼并过程，包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足鼎立的新竞争格局的形成，尤其指出了超大型金融集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诞生打破了日本存款市场、信托市场、证券市场的传统力量格局，为日本金融业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较大变数。至于《从韩国两次金融危机看中国的金融开放与监督》一文，则可视为是中韩金融市场及监管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两个崛起中的大国，又是中亚的两个邻国，地缘和能源因素使两国与中亚联系在一起。《从博弈到共赢：中印在中亚的竞争与合作》一文阐述了中印两国在中亚的战略和能源博弈，并进一步分析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竞争的可能性和合作的必要性，指出中印合作无论对两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中亚的发展和稳定都是最佳的抉择。

本辑集刊专题研究栏以较多的篇幅关注社会与文化领域。

《近代上海的亲日韩人》一文，研究了近代中日韩复杂的三方政治关系下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此外，还分别收入了关于人口、社会生活、农村社区、区域一体化、行政区划等方面的专论。属于文化领域的几篇论文，宋代的历史编纂与道学、印度的文学与宗教，其研究视野也颇具特色；而《研究中日韩东亚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文献资料书目》，对即将出版的《日据朝鲜时期汉籍书目》作了介绍；两篇关于教

育的论文,则分别涉及了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和工资制度。

在“亚洲论坛”中,分别收入了关于中韩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演讲录。

在“大事记”栏中,收入了 2007 年能源和金融大事记。

本辑集刊较多收入了复旦大学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体现了亚洲研究诸领域扎实的功力与新视角、新方法的结合,值得关注。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本集刊出版提供的帮助。

本刊编委会

2008 年 10 月

# 目 录

编者前言 .....	1
专题研究 .....	1
冯 玮 战争：日本金融体制的推进器 ——论日本金融体制的历史变迁 .....	3
戴晓芙 日本银行业超巨型兼并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 .....	35
张徐乐 从韩国两次金融危机看中国的金融开放与监管 .....	48
张贵洪 戎婷蓉 从博弈到共赢：中印在中亚的竞争与合作 .....	59
孙科志 近代上海的亲日韩人 .....	68
路伟东 长江三角洲历史人口初步研究 .....	75
黄敬斌 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农民的副食消费 .....	90
俞纯麟 戴建方 农村社区生活空间与公共性问题 ——江苏省射阳县乙村个案分析 .....	107
翁 瑾 改革开放初期长江三角洲的区域一体化与技术扩散模式研究 .....	124
徐建平 民国时期的军事行动与政区调整 ——以立煌建县为例 .....	136
姜 鹏 历史编纂与道学之间的呼应 ——以范祖禹《唐鉴》为中心 .....	149
徐志啸 李金云 泰戈尔散文诗中的宗教体验 .....	198
傅德华 研究中日韩东亚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文献资料书目 ——写在《日据朝鲜时期汉籍书目》出版之际 .....	210
毕春春 张慧洁 社会经济形态变迁与高等教育本质变化 ——从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视角 .....	228
钱 磊 美国教师绩效工资制度的分析与反思 .....	240
亚洲论坛 .....	249
沈丁立 中国的大国崛起和中韩关系 .....	251
乡田正万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日新关系 .....	257

大事记 .....	265
2007 年世界能源大事记 .....	267
2007 年世界金融大事记 .....	275
信息交流 .....	295
“揭开世界顶尖智库的面纱：您所不知道的胡佛研究院” ——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苏萨先生来复旦演讲 .....	297
复旦大学与胡佛研究院合作研究重大突破 亚洲研究中心承办三本 著作的发布和研讨会 .....	300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行新的专题讲座,探讨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 .....	302
2008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	303
2007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结项课题 .....	304
2008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结项课题 .....	307

# 专题研究



# 战争：日本金融体制的推进器<sup>\*</sup>

——论日本金融体制的历史变迁

冯 玮<sup>\*\*</sup>

最近，因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构成了强烈冲击，并引起各界热议。但是，有一个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似被忽略：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同样发生了以房地产问题为发端的“金融危机”并使“泡沫经济”崩溃，且日美以房地产为“第一张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几乎如出一辙，但两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当然，构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即日本和美国金融体制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一思考，我根据多年对包括金融体制在内的日本经济体制的所谓“研究”积累的微薄知识和认识，草撰了这篇拙稿，以期引起同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当之处，敬请拨冗赐正。

—

1600年9月15日，德川家康与其敌对势力进行了一场历史性战役：关原之战<sup>①</sup>。关原之战的炮声，无异于庆贺德川家康荣登将军宝座的“礼炮”。1603年，德川家康在京都附近的伏见城领受了天皇敕封其为征夷大将军、右大臣（从一位）的宣旨（将军宣下），在江户建立了幕府。此后至1868年（明治元年）的260多年历史，被称为“江户时代”，又称“德川（幕府）时代”。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的“近世”。日本风云激荡的近代化的序幕，即在幕末时期拉开。

关原之战不仅为德川幕府举行了揭幕礼，同时也为历经“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一战、二战最终建成的现代日本“金融大厦”举行了奠基仪式。因为，追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现代性”的历史研究——近代西欧、东亚与南亚地区现代性的形成》（项目号：07JJD770007）阶段性成果。

\*\*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关原”是日本关东和关西地区的“界标”，位于岐阜县境内。通过这场战争，德川家康扫除了敌对势力，奠定了以后称雄日本的基础。

根溯源,现代日本金融体系,就是在江户时代“奠定基础”的。史实证明,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即着手整顿金融秩序,创设作为金融机构的金座、银座、钱座,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货币体系。

金座是金币铸造所,分“大判”金座和“小判”金座。“大判”是一种大椭圆形、重约合今制 165 克的金币;小判是一种圆形标准金币,重 1 两,故又称“1 两判”。关原之战后不久,江户小判金座成为主要金币铸造所,受勘定奉行(幕府主管财政的官员)直接管辖。小判金座旧址,即现在位于东京的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总行所在地。

银座是银币铸造所,最初由德川家康于 1601 年设于伏见(今京都郊外),至 1608 年迁至京都。1606 年在骏府另设有银座,也于 1612 年迁至江户。银座在幕府的保护下享有银币生产特权,并向幕府缴纳“运上”金(税金)。银座铸造发行“丁银”(又作“挺银”)、“豆板银”(也叫“豆银”、“小玉银”、“碎银”)。著名的东京“银座”即因此得名。

钱座也叫铸钱座,是江户时期掌管铜钱铸造、发行的机构,只是和金座、银座不同,钱座最初属于非常设机构。1606 年,幕府开始发行铜钱“庆长通宝”。1636 年幕府任命银座“年寄”(官职)秋田宗古在江户芝及近江阪本开设钱座,铸“宽永通宝”。1736 年幕府又在大坂(按:1870 年,因大坂的“坂”有“土反”之讳而改为大阪)、长崎增设钱座。各钱座均受金座、银座师傅统辖,不任命专门官吏。

通过上述金融机构及其措施,幕府建立了全国性金融体制和统一秩序。1636 年后,由于“宽永通宝”的大量铸造,铜钱流通使货币流通更趋统一,并因此使江户时代的货币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确立。

需要强调的是,如上所述,江户时代的货币制度既不是金本位制,也不是银本位制,更不是铜本位制,而是金、银、铜并立的“复本位制”,俗称“三货(币)制度”。在货币流通方面,日常生活以铜钱流通为主,金银货币一般仅用于礼仪赠答或大宗交易。同时,江户时代货币制度有一个特征,即以江户为中心的地区实行“金建”或曰“金遣”,即金本位制,以大坂为中心的京畿地区则盛行“银建”或曰“银遣”,即银本位制。江户初期,银币是称量货币。但是自 1765 年定额银币“明和 5 匁银”铸造后,银币日益成为“取代金的通用银”的计数货币,并日益成为金币的辅助货币,金币相对于银币的王座地位,也因此更加不可撼动。虽然德川幕府在江户时代几次规定了法定汇率即“三货”的比价,但三种货币的兑换比价事实上因受市场比价和流通量的影响而浮动,长期维持着“变动汇率制”。

除了“硬通货”外,作为“三货”的补充,各藩还发行被称为“藩札”的大名领国纸币(按:“札”是日语,意为“纸币”)。以往学界认为,宽文元年(1661 年)越前福井藩发行的“银札”是最早的藩札,但近年据学者考证,福山藩在宽永七年(1631 年)

已经发行“银札”。在藩札发行之前,各地已有“私札”,如大和的下市银札、今井町银札,摄津平野庄町的银札等。这些私札发挥了作为信用货币的功能,为藩札的发行奠定了基础。最初,藩札和幕府的金札、银札、铜札等均可以和“正币”即硬通货兑换。但是以后由于各藩财源穷乏滥发藩札,使之最终成为仅限流通、不可兑换正币的“不换纸币”(又译“代金纸币”)。

毋庸置疑,发行藩札的主要原因是随着领国经济的发展,在领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区域性市场,需要通过藩札促进交流,活跃经济。藩札的发行状况和经济发达水平成正比,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近畿地区,发行藩札的领国最多。因此,从表1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江户时代日本各藩的藩札发行情况,而且可以了解与之相应的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表1 全国各藩藩札发行状况

单位:藩

	奥羽	关东	中部	近畿	中国	四国	九州	合计
初期	2	2	7	12	12	5	6	46
中期	2	3	3	18	5	4	8	43
后期	1	7	9	16	8	1	12	54
小计	5	12	19	46	25	10	26	143

说明:初期为庆长至宝永年间,中期为正德至享和年间,后期为文化至庆应年间。

资料来源:作道洋太郎:《日本货币金融史研究》,未来社1961年版,第34—35页。

藩札的发行必须经由幕府认可。1707年,幕府曾一度颁布禁止使用“藩札”的命令。1730年,为了缓和货币不足,幕府解除了上述禁令。以此为契机,藩札的发行趋于制度化,日益成为领国货币。但是综观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往往根据“石高”(大名领受俸禄即稻米的数量)确定藩札通用许可年限:20万石以上的藩为25年;20万石以下的藩为15年。随着对“藩札”发行采取许可制,幕府的领国货币统制政策进一步趋于体系化。至江户时代末期,幕府本身也开始发行纸币。

由于幕府采取了金、银、铜(钱)“三货”并用的货币政策,因此进行“三货”之间兑换的“两替”业(按:“两替”是日语,意为“兑换”)作为一个必需行业日趋繁荣,并因此使江户时代的信用体系日趋发达。

两替业首先在大坂形成、发展,后延及江户。大坂的“两替”有“本两替”、“钱两替”、“南两替”三类。

“本两替”又称“本仲间两替”(“仲间”为日语,原意为“伙伴”),通常称“两替

屋”，经营类似于今天银行的业务。根据规定，在该行业从业 30 年以上者，在履行一定手续后即可自行开业。在江户时代初期，“本两替商”共有约 200 余家。至 18 世纪 20 年代达到约 340 家。“本两替”中最有势力的是“十人两替”。所谓“十人两替”是 1661 年大坂町奉行（地方长官）石丸定次从两替商中选出的 10 个大“两替商”。“十人两替”统领和监管其他两替商，支配金银比价，同时掌管幕府官方资金的出纳和向幕府提供信贷。“本两替”财力雄厚且多数兼各藩“藏元”（商品交易代理）、“挂屋”（收储包括商品交易所得资金在内的金融代理），其上层是幕府的“御用达”（幕府金融和商贸承办者）。幕末的江户也存在“本两替”和“钱两替”，其中从事黄金业务的有 4 家。这 4 家两替商也是幕府的“御用达”。以大坂、江户的“本两替”为代表的两替商，除了主营金融业务外，还兼营各种商务，财力雄厚。

“钱两替”又称“三乡钱屋仲间”，从事铜（钱）兑换业务。所谓“三乡”的含义是：居民迁移自京都附近的伏见的 80 余町，最初称“伏见组”，并以“本町通”（“通”意为“大道”或“大街”）为界划分，南面的称“南组”，北面的称“北组”。另外，在大川以北的町家称“天满组”。三组合称“大坂三乡”。多数“钱两替”经营稻米杂物买卖，兼营铜钱兑换业务。

“南两替商”又称“南仲间两替商”，是大坂南部的“钱两替商”，资力强于“三乡仲间两替商”，但数量相对较少。根据幕末嘉永年间的记录，“三乡钱屋仲间”有 617 名，“南两替仲间”有 544 名。

除了“两替”外，江户时代还有一种被称为“无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无尽”源出佛典，据说从印度、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无尽”俗称“赖母子讲”，始于镰仓时代，流行于室町时代，在江户时代最为发达，在明治时代以后依然盛行。“无尽”不仅是一种民众互帮互助的共济性融资组织，而且还为工商业者提供信贷，为庶民提供贷款，贷款数额从数十两至数百两不等。

另外，在江户时代还有一种“两替”，曰“米方两替”。“米方两替”又名“遗来两替”（“遗来”意为“筹措”），是堂岛米市场的豪商经营的一项业务，主要经营方式是通过收受“敷金”（保证金、押金）和为买卖双方订立相关契约、规定等，为稻米买卖双方提供便利的赊账业务，并收受“步银”（手续费）。

“两替屋”的主要资金来源和现代银行一样，是资本金和储蓄。从家产中获得的资金是两替商最大的“元手”（本钱），其数额多少甚至在家族内部也是绝密的。储蓄在幕末已经相当普遍。付给储户的利息的资金来源当然是借贷利息。因此，两替商最关注的，就是存储和借贷的利率差。为此，他们一方面争取储户，根据储蓄量和存储期限增减利息，并设定了活期储蓄和各种定期储蓄；另一方面则竭力争取和扩大借贷客户，将储户的钱贷出去，通过利率差获取收益。借鉴长期的经验，两替商熟知储户支取储蓄的比率和时期，因此能够运营收储资金的 75% 强。

这种风险意识，已无异于现代银行通过设定“储蓄准备金比率”规避风险意识和规定。

在收储、支付和非现金转移时，两替商采用两种“手形”作为凭证。所谓“手形”是期票、汇票的总称，属信用货币，因古文书有按捺手印以加强凭证作用的习惯而得名。“手形”的萌芽始于镰仓时代，在江户时代定型。在镰仓末期转用于商业贸易的结算称“为替”。“为替”原称“割符”、“替钱”、“替米”，最初用于收购年贡米，具体做法是交付人将“替钱”交给“为替人”（经纪人），“为替人”再将此钱定期转付领取人，并将这一过程记入“割符”。经营此种业务者被称为“替钱屋”、“割符屋”、“两替众”。室町时代亦采用此法，至江户时代趋于完备和流行，并始称“手形”。

江户时代，以票据为支付手段的“手形”贸易由大坂天王寺屋五兵卫首创。除了一地内的信用贸易外，在元禄时期，异地交易不用现金而使用汇票的方法趋于普遍，特别在大坂市和以江户为中心的异地交易中被广泛使用。江户时代主要有两种“手形”，一种日语名称是“預かり手形”，中文译为“收储凭证”或“存款证券”，是两替商收取储蓄时交给储户的“凭票即付票据”，类似于今天的“存折”。另一种日语名称是“振出手形”，中文被译为“发出票据”，是在支取储蓄资金时储户交给两替商的“手形”，相当于今天的“支票”。两种“手形”中最常用的是“振出手形”即“发出票据”，因为“振出手形”存在两大便利，一是储户可以根据用途支取必要金额；二是如果因为被疑是假票据等遭到拒付，可以在流通过程中“顺藤摸瓜”，找到“振出手形”的原初出具者，进行债权诉求。

当时，两替商可以为客户开具超出储蓄额的“振出手形”，用现代语言表示即“透支”。在幕末，两替商已经形成了网络般的密切关系。财力较弱的两替商特别是在资金紧缺时，往往依赖财力雄厚的两替商，两者关系被称为“母子两替商”。一个“母两替商”可有几个“子两替商”，反之亦然。他们之间经常使用的“振出手形”有两种：一种是彼此之间结算用的“振差纸”，另一种是自身资金不够而紧急融资用的“空手形”。顾名思义，“空手形”的票面数额往往超出原有资本。在极端情况下，两替商有时可开具超出自己所持资本六七倍的“空手形”。“空手形”的流通，一方面表明了“母子两替商”的亲密关系，一方面表明了由“母两替商”的金融信用支撑的信用体系在当时已相当发达。值得关注的是，他们这种关系，已经呈现了现代银行业内部关系的雏形。

江户时代，商人之间的交易一般由如下方式构成：货主（生产者）—“问屋”（批发商）—中介—零售商。但是，货款的支付方式却因商品种类而异。商人之间原则上仍采取现金交易，如鲜鱼、烟草、绢丝等均是现金交易。采取信用交易的商品仅占少数，如舶来品、纸等。在采取“赊账”即信用交易时，时限从3日到1年不等，

亦常有分期支付,如每双月的30日为货款支付日。在采取这种支付方式时,一般都先支付“手形”,由“两替商”充当中介,同时也充当信用担保,具体做法是由购货商向“两替屋”发出“振出手形”(又称“大坂手形”),由两替屋转给供货商。由此可见,不仅两替屋已具有当今银行的一大功能,而且原本仅仅作作为现金储蓄凭证或信用凭证的“振出手形”,通过商品交易也充当了货币的角色,成为“一般等价物”,并通过“透支”成为借贷手段,完全具有“支票”的功能。如此,不仅加速了商品流通,而且极大地减少了金银货币的流通量。因此在幕末,以“振出手形”为基础的两替商的业务,在各大城市均频繁展开,非常成熟。而不同城市之间的交易,则通过同样具有支票功能的“为替手形”进行。幕末两替业的结构和运作方式,特别在信用方面,显然已构成现代银行业的雏形。必须强调的是,日本金融业之发达,在幕末开港后令当时占世界金融业鳌头的英国人也甚为惊讶。

1691年,德川幕府创设了用于公款转送的“公金为替”(公款汇票)。由于允许两替商在大坂拿到“公金”至送到江户缴纳有60天期限,而这60天是没有利息的,因此“公金为替”又称“60日为替”。这种“公金为替”包括“本手形”、“置手形”、“添手形”3个种类。

1723年,用于大名诸侯资金转送的汇票“江户为替”(又称“大名为替”)也得以创设。“江户为替”也是一种汇票,用于将军在直辖领获得的资金转至江户,以及大名诸侯将在大坂出售领国的物产所获得的资金、筹措的贷款等送往江户等。总之,江户时代信用制度的确立和发达加速了商业资本的周转率,促进了商品经济,特别是商品流通。

在幕府行将结束时,日本现代银行业的探索也随之开始。1863年6月,最坚决的“尊王攘夷”根据地长州藩派遣伊藤博文、井上馨等5人赴伦敦留学。1865年4月,萨摩藩也派遣了由五代友厚率领的15名留学生赴伦敦留学,其中包括以后成为明治政府外务卿的吉田清成。虽然当时留学生前往伦敦是学习西方科学理论和技术知识,但在明治政府开始构建近代银行框架时,他们的见识和经验无疑成为很好的材料,如吉田清成就曾建议明治政府仿照英国模式建立近代中央银行。

另一方面,在开港以后,1863年夏天,以英国银行为先驱,外国银行相继进入日本,并大都集中于横滨,其所拥有的资本金令日本的两替商不能望其项背。如按照当时外汇比价换算,巴黎信用银行为9000万两银,东方银行为4200万两银。

外国银行的业务大致可分为三类:储蓄、借贷、跨国支付和兑现。其中最主要的是跨国业务,而这恰好是虽然金融网络和技术已相当发达、成熟,但在国际金融界没有地位并纯属“乡巴佬”的两替商的软肋。例如,英国的东方银行出售由伦敦、爱尔兰、新西兰、旧金山、纽约、巴黎支行和代理行兑现的支票;向有旅行用款

需求的客户出售名为 circular note 的、居旅行支票和信用票据之间的金融信用凭证。在储蓄和借贷方面,东方银行为储户提供活期、普通、定期三种服务,并有支票和其他票据的兑现服务。在借贷方面也有支票兑现和其他证券的收购,以及用金银和其他商品为担保的借贷。不过,除了跨国业务外,在储蓄和借贷业务方面,外国银行虽运营手段和提供的服务先进,但却并不占优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外国银行的业务区域仅限于开港地区,业务对象和内容仅限于同三井进行金融交易。

首先迫使日本开港的美国,由于1861年4月国内发生南北战争,因此在1868年即明治维新之前,没有一家银行进入日本。当时在日本的外国银行主力,是英国银行。随着伦敦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大,进入日本的英国银行业务也急剧发展。例如印度商业银行在进入日本的翌年,即兼并了另一家英国海外银行印度西方银行。但是1866年夏,由于英国金融危机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多家英国海外银行破产,东方银行亦受影响并最终破产。换言之,外国银行在日本的活动刚刚起步即遭受重挫。因此,明治时代外国银行业务在日本铺展有限。在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日本现代银行体系的建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

## 二

我的课题研究合作者、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杉山伸也指出:“‘日清战后经营’的经济构想,不仅成为决定日本(二战)战败前的发展方向的原型,而且政府系银行和民营银行并存的金融体制,即使在日清战后经营期设立的特殊银行转换为普通银行的战后时期,其基本结构也没有发生变化并一直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佐藤正则也写道:“相当于日本金融体制形成期的明治金融机构的构建,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是至1890年形成骨骼的金融机关的设立,以国立银行条例(1872年)、银行条例(1890年)颁布,普通银行业务开始展开,以及日本银行(1882年)和作为贸易金融机构的横滨正金银行(1880年)开业、作为大众储蓄专门机构的储蓄银行的设立(1890年)为标志,金融基础设施得以构建。第二时期则是日清战后经营时期。”<sup>①</sup>通过对“日清战争”前后日本金融结构和体制的变迁的考察,我们不难认为上述两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

1868年6月,明治新政府在最高行政机构“太政官”之下,设置了财政主管机构“会计官”(翌年8月改称大藏省)。在新生的明治政府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中,如

---

<sup>①</sup> 杉山伸也编著:《“帝国”日本的学知》第2卷《“帝国”的经济学》,岩波书店2006年版,第5、72—73页。